

## A 种社会里的 B 种人

孟晓青

1975 年秋天，我从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从一个马背上自然游牧的牧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

我进了北师大数学系后不久，有人指着一个瘦瘦的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是很矮的身影告诉我：这是王世强先生，数理逻辑专家。当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是后期了，大家对系里的教授一律改称“老师”，而不是“先生”，但是这里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系主任张禾瑞先生，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对北师大数学系的成长建树颇多，后来一直身体有病在家，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另一个就是王世强先生了。王世强先生是百分之百的正宗中国土产，虽然不是极强壮，但是一直没有大病，他天天都到系里来，好象也不是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50 多岁的王先生戴着一副只有学生们才戴的便宜的白边眼镜，一脸书生气，笑起来天真无邪，就连最革命的造反派也不相信在这白边眼镜后面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留一个古董又何妨，于是大家就齐声喊他“王先生”，就连我们这些新进校的工农兵学员也包括在内。

我第 1 次近看王先生是在一次去天安门游行的途中。从北师大到天安门来回怎么也得三、四十里路，还要扛着各式标语牌，体弱年纪大的老师们都没有去。走去天安门时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往回走时就累得泄了气，不少人坐公共汽车回学校了。但是标语牌上不了车，总得有人扛回学校，我当时感觉良好，就扛着标语牌随着大大缩短了队伍往回走。前面的一个人穿着几乎拖到地上的呢子裤子，裤脚上满是尘土，边走边和旁边的人说笑。他偶尔一回头，我看见了那白边眼镜和无邪的笑脸。哈，这个书呆子能够走这么远，我顿时对他另眼看待了。

我们不断听到关于王先生的各种非常不一般，相当有趣的故事。

在职工食堂吃饭，王先生从来不问哪个窗口卖什么，他总是捡队排的最短的那个窗口。站在最短的队伍后面可以节省时间最快地买到饭，结果他是一连好多天都吃面条。发了工资，王先生也不去存银行，而是从书架上随手拿下一本书，把纸币夹在书中。若有人来借钱，他就翻开一本书，问够不够。若是不够，就再翻另一本书。王先生一辈子没有结婚，他除了书之外，没有任何其它嗜好，星期天要是出门，也是去书店。系里的几个教授不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数学家，就要像王世强先生那样没有他念。”

工农兵学员没有开数理逻辑课，王先生从来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后来我要到美国布法罗去读研究生，系里希望我学代数，而布法罗的代数就是范畴论。范畴论和环论群论也有联系，但是范畴论与数理逻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于是系里的头儿对我说：“你与王世强先生联系吧。”从此，我和这个怪老头儿熟悉了起来。

王先生是个大好人，绝对的东郭先生，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据说 1957 年反右时，王先生的 10 个研究生中 9 个是右派，但是人们左看右打量这右派的导师，却是怎么也评他不上右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招收研究生，王先生的研究生买稿纸，向国外发信寄文章，都到他这儿从他的工资里报销。王先生助人为乐绝对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别人借了他的钱不还，不管多少他是根本不去过问。有人借了他的书不还，他也不去追究，却说送给他算了。他的学生弄丢了图书馆的书，他就去赔偿。他一人住三居室的一个单元应该是宽敞有余了，结果壁橱里、房间里、过道上挤满堆满各式大小不等的包裹、麻袋、箱子。我几次回北京去看他，问他这些包裹麻袋箱子都是谁的。他说是老乡寄放的。我又问：你哪儿来的这么多老乡？王先生只笑不答。问烦了，他就说：这不关你的事。

他的宿舍成了遍布全国各地他的学生、别人的学生、他的同事和同事的同事们南来北往的借宿之地。他的一个还没有分到房的研究生，孩子大人一家几口人在他家一住就是两年

半。王先生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还尽他的最大本事热情招待。近些年来，系里系外、校内校外的人们为了评职称、争荣誉、讨奖励，都来找王先生写推荐信、褒扬信。这常把老头儿忙得团团转，但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总说这个人这样这样好，那人那样那样好，从来不提别人的缺点。若有人提及此人彼人的缺点，王先生总是有合理的解释：此人身体不好，彼人家庭负担太重。

这个和蔼的老头儿有时也可以顽固不化，让人干瞪眼。不断有人建议劝他装修一下他的宿舍，买几件象样的家具，但是不论什么人怎么说，他还是睡他那不知多少年前从学生宿舍搬来的单人木床，使用着别人家淘汰下来的桌子柜子，一台 12 吋的黑白电视一直站在茶几上。这个逻辑学家的三间宿舍却是没有一点逻辑秩序的影子，书籍报纸稿件食品用品堆得到处都是，上面落有厚薄不等的尘土。多少次我说我来给你收拾收拾，他的学生们也要来为他大扫除，这可急坏了老头儿，摇头带摆手：“不！不！不！不！我这是乱中有序，你们一收拾倒是干净了，但我就什么也找不着了。”这倔劲一上来，就是拖拉机也是拖不动的。我们只好做罢，任他在这“杂乱有章”中安祥从容，与世无争地生活。

自从我跟王先生联系上以后，王先生从来没有指示我去做哪方面的研究，读哪方面的书。他平等地与我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

王先生是国内数理逻辑方面的领袖。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不少人左右逢迎，心机用尽，可是王先生却是两耳不围窗外事，照吃照睡照样读他的书，后来因为年龄的限制没入选（那时候王先生已近 70 岁），他反过来给为他鸣不平的人做工作。

面对现代化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王先生坦然地笑着说：“我们是 A 种社会里的 B 种人，可能要成为恐龙了。”